

· 战时上海 ·

WARTIME SHANGHAI 战时上海

(1937—1945)

〔日〕高纲博文 主编 陈祖恩 等译

上海遠東出版社

战时上海丛书 Wartime Shanghai

战时上海

(1937-1945)

〔日〕高纲博文 主编 陈祖恩 等译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战时上海：1937—1945/(日)高纳博文编著；陈祖恩等译. —上海：
上海远东出版社，2016

(战时上海)

ISBN 978-7-5476-1055-8

I. ①战… II. ①高…②陈… III. ①上海市—地方史—1937～
1945—文集 IV. ①K295.1-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5)第 273992 号

本书中文版由日本上海史研究会长高纳博文授权上海远东出版社出版。

本书由上海文化发展基金会图书出版专项基金资助出版

战时上海(1937—1945)

编著 [日]高纳博文

翻译 陈祖恩 马海龙 袁雅琼 宋武全 葛涛 钱晓波 劳轶琛

特约编辑/张国伟

责任编辑/匡志宏 装帧设计/张晶灵

出版：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远东出版社

地址：中国上海市钦州南路 81 号

邮编：200235

网址：www.ydbook.com

发行：新华书店 上海远东出版社

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发行中心

制版：南京前锦排版服务有限公司

印刷：昆山亭林印刷有限责任公司

装订：昆山亭林印刷有限责任公司

开本：710×1000 1/16 印张：20.5 插页：1 字数：303 千字

2016 年 3 月第 1 版 2016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5476-1055-8/K·144

定价：58.00 元

版权所有 盗版必究(举报电话：62347733)

如发生质量问题，读者可向工厂调换。

零售、邮购电话：021-62347733-8538

出版说明

二战中的上海,不仅是上海史研究的一个重大课题,而且也是中国抗日战争史乃至世界反法西斯史研究的一个重要课题。

《战时上海(1937—1945)》由日本上海史研究会会长高纲博文主编,叙述了在日军占领之下,上海的历史真相及当时的众生百态,是专题研究抗战时期上海经济、政治、文化等方面的论文集,涉及面广,考证详细,其中不少内容是此前中国历史学者忽略或研究不多的。

本书作者中,8名为日本学者,3名为中国学者,视角不同在所难免。总体而言,日本学者对战争有揭露有反省,对于中共地下党的抗日斗争也有较高评价。为客观反映日本学界的研究,本书中文版基本完整呈现了原作译文,供学界研究参考。

上海远东出版社

2016年3月

序章

以古厩忠夫先生的学说为中心

高纲博文

前言

2003年2月28日,日本上海史研究中坚人物古厩忠夫先生逝世,享年61岁。古厩先生在1990年日本上海史研究会创立时就担任会长,他主张从都市论的视角来考察上海的特殊性和普遍性,并以此再构筑中国近现代史。¹

古厩先生有关上海史研究的基本视角,主要有以下三方面:(1)都市形成史:以资本主义发展史为基轴,重视发挥其机能的各种网络组织。(2)重视以作为都市形成主体的商绅资产阶级为轴心的社会中间层(都市精英)的活动,同时,也注目作为都市杂业层的下层民众的存在。(3)总括近代上海的关键词,既不是西洋化也不是传统中国,而是由中国文化和西洋文化相融合而产生的新质地文化的诞生场所,即“克里奥尔(creole)上海”。²日本上海史研究会以古厩先生的课题意识和基本视角,对“国际都市”上海的历史进行了多方面的研究。我们与古厩先生一起出版了日本最初的上海通史《上海史》(日本东方书店,1995年)、其姐妹篇《上海人物志》(日本东方书店,1997年)、《上海:形形色色的职业》(日本勉诚出

1 参照《古厩忠夫氏追悼特集》(《近きに在りて》第43号,2003年)。

2 高桥孝助、古厩忠夫编《上海史》(东方书店,1995年,269—272页)。

版社,2002年)及正式的研究论文集《上海——多层性的网络组织》(日本汲古书院,2000年)等。

古厩先生的上海史研究是在1970年代中国工人运动史的研究中,从对上海民众的关心开始的,1980年代正式确定上海史研究的方向,至1990年设立日本上海史研究会。其间,古厩先生于1986年作为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客座研究员旅居上海,无疑,这使他萌生了研究上海史的大动机。进入1990年代后,古厩先生因忙于校务而累坏了身体,1994年接受了胃癌的手术,在病后疗养的同时,继续进行上海史研究,特别是将最大的精力关注日中战争时期的上海,并留下了许多研究业绩。

从2001年开始,以古厩先生为会长的日本上海史研究会进行了有关日中战争时期上海历史的研究共同研究,计划于2005年3月以《战时上海(1937—1945)》的书名出版其研究成果。在日本,有关该时期上海的研究,古厩先生的研究是最系统、最完整的。我们在实施共同研究的过程中,常常参照古厩先生的研究,受益匪浅。自病倒以后,古厩先生虽不能参加共同研究,但是,古厩先生的研究业绩是我们构想框架的前提,在此意义上,我们的研究将以继承、发展古厩先生的学说为目标。

本文将系统地整理和介绍古厩先生有关日中战争时期上海的研究成果,即古厩先生对日中战争时期的上海具有哪些研究意识,提出过哪些论点,有怎么样的研究成果。

一、作为抗战力量的上海民众

古厩先生有关战时上海的研究,是在日中战争史研究与上海史研究交叉进行中产生的,两者错综交杂,难分难解。1970年代初以湖南工人阶级和工人运动研究在学术界亮相的古厩先生¹经过四五年的研究空白,于1983年发表题为《日中战争与上海民族资本》的论文。在此以前的日本有关日中战争史的研究,在研究中国抗

¹ 有关古厩忠夫氏的中国劳动运动史的研究,可参考菊池敏夫、高纲博文《中国劳动运动史研究の轨迹》(前引《近きに在りて》第43号)。

战力量形成时,都从共党政权领导下的农村抗战和国民党重庆政权的内地抗战的视点出发,忽略了以上海为中心的被占领地区的抗战。古厓先生在论文中对此进行了批判。确实,有不少考察日本占领地政治和经济战的研究,那些研究虽然对中国民族的抵抗,不仅从军事方面,也从政治、经济等方面阐明了全面的持久战的重要性,但是对上海的分析却是不充分的。就中国的抗战力量,古厓先生在另一篇论文《日中战争·上海·我》中有下列的述说:

“抗战力量的基础,实际上是包括兵力再生产在内的物资生产力。作为支持中国抗战力量的这方面要素,重庆国民政府的诸建设、中共领导下以延安为中心的抗日根据地诸建设、以上海租界地区为中心的被占领地诸生产,都是获得苏联、英国、美国等反法西斯诸国支援的。因此,可以考虑它们构成了抗战力量的三极构造。”¹

即,古厓先生提出把重庆、延安、上海作为中国抗战力量三极构造的论点,就地区而言,上海及被占领地分别将重庆、延安作为其顶点,构成了两个三角形的底边。另一方面,日本为了对抗中国的抗战力量,企图在上海和其他占领地依靠傀儡政权构筑其统治的三角形,但经过统治和反统治的拉锯战,最终还是以失败而告终。

日中战争时期,特别在 1937 年以后的 8 年间,上海处于日军武装势力下,虽被称为“日本占领下”、“被占领地域”,租界也明显缩小了其领地,但是,上海还是一个基本自由的地区,1941 年 12 月 8 日亚洲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未被日军接收,到 1943 年 7 月归还给汪精卫政权为止,租界继续存在。有关亚洲太平洋战争前上海租界的重要性,古厓先生指出:

“那里(上海租界——引用者)虽然只有区区 30 平方公里的面积,却在日中全面战争的一半以上的期间维持了‘孤岛的繁荣’,成为日本帝国主义的眼中钉,并进而成为把日本逼上太平洋战争之路的一大原因。脱离上海,就无法考察重庆政权的抗战力量。其同新四军的关系亦是如此。当然,对日本帝国主义利用上海的一面,也不可无视。此外,正因为上海租界是反映围绕日中战争的国

1 古厓忠夫《日中战争·上海·私》(《近きに在りて》第 5 号,1984 年,21 页)。

际关系的一面镜子,因此对上海的研究还能告诉人们:日中战争是一场国际性的战争。”¹

就对中国民众来说抗战是怎么回事的问题,古厩先生作了如下论述,表达了中国民众是形成抗战力量基盘的见解。²如果以三角形来形容全中国规模的民族抗战,位于其顶点是八路军和新四军,他们站在抗日的最前线,是将全部精力都投入到抗战中的最积极部分。而构成底线的是在被占领地生活,虽然深知中国处于危机中但由于生活所迫而未能起来抗日的民众。生产和生活构成了抗日战争三角形的底边,在持久战中维持生产和生活是燃眉的课题。但是,生活和抗日是一对矛盾的存在,迫于生活而无暇顾及抗日的人群中,变成汉奸的也不在少数。正因为如此,在生活中组织抗战是非常关键的事情,一边生产一边战斗的根据地把生活和抗日相统一,才构成抗日战争三角形的顶点。

对处在以重庆和延安为顶点的抗战力量的三极构造底边的上海和被占领地的人们而言,重庆和延安就像灯塔一样不断地影响着他们。1940年的百团大战使上海的抗日活力大增,同时,上海的通货战的动向也影响了重庆抗战,他们相互作用着。而代表抗战方向的重庆和延安的离合,也严重地影响了上海的动向。如果把留在日本占领下的上海人作粗略划分的话,可以划分为三种:以上海租界为据点进行抗日救国活动的人、想留在上海发财的人,以及国民政府军撤退后无处可去而不得不留在上海的人。他们分别拥有自己的抗战三角形,有机地结合在一起。对个人而言,又拥有一个以生活为底边、与抗战有着紧张关系的抗战三角形。这些无数的大小三角形的组合形成了中国的抗战力量,由于分处在各个不同位置的各个阶层最大限度的努力,使抗战的三角形得以稳固和壮大。这种抗战三角形绝对不是美丽的几何学图形所能表现的,有关中国民众不关心抗日的证言也举不胜举,但是,古厩先生指出,在日军占领下受到掠夺的中国民众的生活是非常严峻的,“不屈服于掠夺而坚强地生存下去,这本身就意味着抗战”。³

1 古厩忠夫《日中戦争と上海民族資本》(叶山禎作编《传统的经济社会の开展下》,时潮社,1983年,77页)。

2 参照前引《日中戦争・上海・私》。

3 古厩忠夫《日中戦争史叙述の视角》(《环日本海研究年报》第10号,2003年,64—65页)。

二、战时上海的社会变化

古厐先生在试图概观战时上海社会变化方面著有论文《日中战争后期的上海社会与社会精英》,¹该文的主要课题是在考察上海经济界领袖人物闻兰亭等以“地域的安宁”为使命的社会精英的传统行动方式,以及以此为基础的多方式抗日抵抗活动后,阐明了他们为应付1943年日本对华新政策而转向与日本协力的过程。该文在考察此课题过程中,以日本的对华政策、汪精卫政权、社会精英的三者变化为基轴,按下列时期划分,对战时上海(1937—1945)的社会变化予以了系统的论述。

1937年8月—11月(第二次上海事变)

始于1937年8月13日的上海全面战争(第二次上海事变),由于中国军民的顽强抵抗,一直进行到同年11月11日日军占领华界为止。

1937年11月11日—1941年12月(“孤岛时期”)

“孤岛时期”上海的显著特征是作为上海经济、文化中枢的公共租界和法租界在日军占领华界后依然存续着。没有成为战场的“孤岛”——上海租界²,使得人、物、财都集中而来,具备了扩大经济活动的所有条件,反而比战前更繁荣了,此被称为“孤岛的繁荣”。

“孤岛时期”的上海大部分社会精英和市民对日本基本上都采取了一贯的非协力的抵抗方式。这一时期网络组织般的“地域自治”都以对抗日军的形式发挥了作用。上海、长江下游的日中战争

1 同论文收录于日本上海史研究会编《上海——重層するネットワーク》,汲古书院,2000年。

2 殿山圭一指出将“事变下的上海”称为“孤岛”的是重庆国民政府(《上海》,岩波书店,1942年,160页)。“孤岛”上海这一称呼此后在国内的普通民众间散布并流传至今,古厐认为物资、人口、资金大量涌入“孤岛”上海,作为连接重庆政府的抗日据点,实际上上海并非所谓的“孤岛”。并且,当时的日本研究者也对上海被称为“孤岛”这一现象进行了如下的批判:

“华中地区成为日本占领地区以来,产生了上海的文化以及经济的孤岛化这一说法。然而上海绝非孤岛。想要触及盘踞黄浦江对岸的英美法等国的势力以及追随其后的重庆政府的动脉还是有其困难之处。”(石滨知行他《上海》,三省堂,1941年,107页)。

实际上是日中双方以获取物资为中心而展开的网络战。

1938年10月以后,日本方面为对付重庆政权的持久战,认识到构造长期战体制的必要性。“占领地经营”的最大争论点是,军事侵略进攻、军事征用如何转向为占领地经济建设和经营,军事战如何转向为经济战?那时的必要条件是对继续抗战的重庆政权采取经济封锁,在经济战中夺取优先地位。日军占领地中的“孤岛”——上海租界(与重庆政权有联系的中国企业和金融机构的集中活动地)的存在便成为日本的“眼中钉”。

1938年12月,日本方面进入长期战,形势要求进行正规的占领地经营,兴亚院应运而生。围绕着占领地经营的问题,是要“长期建设”还是要“战争遂行”,现地日军与兴亚院争执不休,在许多场合,“战争遂行”占了上风。两者争执最多的是占领地经营中最基本的通货问题,围绕着通货政策的不同意见,现地日军主张“军票一色”,与兴亚院的华兴商业银行券出现了明显的对立。

为了切断“援蒋通道”,日本方面强化了对继续抗战的重庆政权的经济封锁,但是,持续保持着“孤岛的繁荣”的上海租界,通过中国人关系网络,与周边地区和内地保持联系,使日本的经济封锁像竹篮打水一场空。为此,日本方面采取更大规模的经济封锁,同时,对占领地内的物资流通实施了更严格的统制。

虽然日本方面凭借经济封锁和军票,独占了物资调配,在相当程度上扼断了中国方面原有的物资流通网络,但也导致了占领地经济衰退、物资流向非占领区的恶果。

1940年3月汪精卫政权成立后,面临的最深刻问题是由于经济封锁而造成的占领地经济的麻痹。如果不重新探讨物资统制问题,汪精卫政权的实效统治将无法进行。日本方面虽就此采取了一定的对策,但其经济封锁依然不变。

汪精卫政权强硬地提出了在兴亚院政策范围内的“自立”要求,于1941年1月设立中央贮备银行,发行了贮备券。

1941年12月—1943年1月(亚洲太平洋战争前期)

1941年12月8日,亚洲太平洋战争爆发,日军占领公共租界,接收了欧美企业,同时,也接收了逃避在租界的中国资本,很快,“孤岛的繁荣”萎缩了。在上海,日本势力已经渗入到工厂制作业

等基层,与日本对抗,拒绝与之发生关系的中国物流系统,其自身的维持已经十分困难。

总之,亚洲太平洋战争的爆发使“孤岛”——上海租界被消灭,上海社会精英因失去了活动据点而不得不面临着新的选择。¹

1943年1月—1945年8月(亚洲太平洋战争后期)

1943年,随着战局的恶化,日本方面以确保军需物资为条件将形形色色的主权向汪精卫政权移让,实施了“对华新政策”。社会精英们试图打开难局,与日本方面进行了“合作”。战后,他们被作为“汉奸”遭到裁决。

1943年1月,日本以汪精卫政权宣布对英美开战为交换条件,实施新一轮对华政策。日本方面的“对华新政策”是随着其战局的恶化在走投无路的情况下采取的军政措施,其目的是为了更有效地在中国获得物资。对汪精卫政权来说,这却是打破日本经济封锁和独占性经济支配,改善傀儡状况的绝好机会。

1943年7月,日本方面向汪精卫政权返还租界,上海租界被彻底消灭,上海市民的不服从和抵抗路线遭到沉重打击。失去了租界这一抵抗据点的社会精英——上海经济界首脑为了维持上海的生产和市民的生活,加入汪精卫政权的全国商业统制会,掌握了流通的领导权。

日本方面宣称为了“实现中国的自治统制”建立了全国商业统制会,但实际上却将其作为战时统制体制的物资动员计划的核心。商业统制会的下属机构同业公会被重编,其性质从任意团体的网络组织转变为上意下达的制度组织。

虽然如此,事实上日本未能在上海形成其物流网络,战争末期,上海经济陷入无政府状态的混乱,再次出现日军暴力夺取物资及上海民众自发奋起对抗的严峻状况。

¹ 古厩虽曾论及“太平洋战争的爆发,即日军占领租界并使得‘孤岛’消失之后,上海才完全称为日军的占领地区”(前引《上海——重層するネットワーク》,493页),但在历史上此并非正确的论述。随着太平洋战争爆发,与此同时日军虽进驻公共租界但并非进行接收,且法租界依旧存在。“孤岛”上海的完全消失则是1943年7月日本方面将租界返还予汪精卫政权才导致的。且本人认为,当时的日本并无能力对“国际都市”上海进行“完全占领”(参照本书拙稿《日本占领下的“国际都市”上海》)。

总之,古厪先生将1937年至1945年的战时上海划分为4个时期,强调作为上海社会变动要因的各时期日本对华政策的规定性,具体阐明了各时期汪精卫政权及上海社会精英的不同对策,并明确指出,“孤岛”时期上海社会变化的起因是:1938年末,日本方面为对抗重庆政权的持久战而进入长期战,并正式实施占领地经营政策,而“孤岛”——上海租界对日本占领地经营来说是一个“眼中钉”。同时,古厪先生将亚洲太平洋战争时期的上海社会,以1943年日本“对华新政策”的实施为分水岭,分为前后两个时期,具体阐明了日本“对华新政策”对汪精卫政权和上海社会精英产生的影响。

三、汪精卫政权

古厪先生的汪精卫政权研究是从上海史研究中派生出来的。如前所述,古厪先生批判了延安的“一元性抗战力论”,主张加入重庆抗战、国际关系以及以上海为中心“被占领地”的各阶层抗战力量等诸要素,对中国的抗战力进行内在的总体把握,并将上海置于抗日战争的三极构造中。他指出:1940年3月成立的汪精卫政权,期待上海社会精英的支持。而处于抗日战争“三角形底边”的上海资产阶级和民众具有两面性,与汪精卫政权的对日协力和抵抗的两面性亦有一定亲和关系。虽然古厪先生对上海民众出于维持生产和生活需要而不得已采取对日协力的立场予以容忍,但是,对出于日本的谋略而产生的汪精卫“傀儡政权”及其所实施的各种政策却予以了否定评价。

针对汪精卫是日本的“傀儡”这一评价,J. H. Boyle认为这是汪精卫利用敌人的矛盾实现自身意志的手段,提出应该将其与东南亚的苏加诺、巴莫一样视作对日协力者。¹古厪先生对此论进行了批判:

“与东南亚对日协力的势力相比,汪精卫政权的对日依存度是很强的。造成其政权弱体性的最大原因是与民族主义磁场的逆向运行。与东南亚的情况相比较,其根本性的不同点是不存在对日

¹ J. H. Boyle, *China and Japan at War 1937-1945*, Stanford Univ. press, 1972.

协力与民族主义共立的余地,以及发挥这两者相乘作用的余地。……尽管汪精卫对此作辩解,但汪精卫政权仍是以与抗日势力相对抗的形式成立的。对中华民族来说,汪精卫政权只有在坚持抗日的国民党和共政党政权遭到崩溃,或是向日本屈服时才具有其存在意义。”¹

古厓先生认为,现今的汪精卫政权研究大都集中在其形成过程,即集中在“和平工作”的实现过程,而对其政权建立后政绩的研究却不多,因此,他试图解释“汪精卫政权是在怎样的状况下成立的,想做什么,做成了些什么,没有能够做成什么,其结果又得到些什么”,这些研究以汪精卫政权的经济政策为中心,包括了以下几方面的考察。²

1938年10月,尽管中国主要城市被日军占领,由于中国方面仍不屈服,日中战争进入持久战阶段。日本被迫将军事统治政策改为实施占领地经营政策。其占领地的“经营”如何,左右着战争的趋势。日本试图扶持有力的亲日政权,以“内面指导”的形式实施其对占领地的有效经营。此时,最合适的人物便是汪精卫。

在汪精卫政权前,1938年1月,日本曾在华中地区建立了中华民国维新政府,以日本的军事进攻、军事征用为前提,对抗法币,实施“军票一色”政策,独占基于产业和民族资本企业的军管政策,以及为了封锁蒋介石政权而实施的一系列严厉的经济封锁政策。古厓先生将汪精卫政权建立后在何种程度上改变了日本的这些“军政”经济统治政策的问题作为研究的课题。

汪精卫政权在成立的同时设立新中央银行,发行新银行券,计划在不久统一货币,并于1941年1月建立中央储备银行。中央储备银行的设立虽是日本政府不顾军方反对而实行的为数不多的政策之一,但在银行设立后规定了其有继续军票政策、维持军票价值的义务。

1 古厓忠夫《“汉奸”の诸相——汪精卫政权をめぐる》(《讲座 近代日本与殖民地 六》,岩波书店,1993年,168—169页)。

2 古厓忠夫《日中戦争と占领地经济——华中における通货と物资支配》(中央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编《日中戦争——日本・中国・アメリカ》,中央大学出版部,1993年),前引《“汉奸”の诸相——汪精卫政权をめぐる》,古厓忠夫《“对华新政策”と汪精卫政权——军配组合から商统总会へ》(中村政则等编《战时华中の物资动员と军票》,多贺出版,1994年)。

华中地区的基于产业虽然处于被日本掌握实权的中支那振兴株式会社的卵翼下，在民族资本归还的问题上，最有影响的是包含上海、南京在内的江苏、浙江、安徽三省二百几十家以上的军队管理工厂的归还。作为经济上的要求，汪精卫把这一问题放在首位，日本政府虽然在汪精卫政权成立后同意向中国业主返还工厂，但进入实际的返还交涉时，现地的日军只同意返还小规模工厂，对大规模工厂则强求收买或日中合办。为此，有关军队管理的工厂归还问题陷入僵局。

关于日军的物流支配和经济封锁等问题，古厩先生指出，虽然汪精卫政权成立后日本同意归还物资流通统制权，但由于日军将限制改为无限制，实际等于不归还。这一时期汪精卫政权的政策中最有实效的是以治安对策、确保税收等为目的的清乡工作。因此，古厩先生对汪精卫政权的评价如下所述，几乎是全面否定。

“在成立过程中就显示其无能的汪精卫政权，即使在设立后的过程中也未能改变由现地日军主导的军事优先政策这一基本局面，加深了人们对其傀儡性的印象。”¹

伴随战局的恶化，日本方面以确保军需物资为条件，将各种各样的主权向汪精卫政权移让，于1942年12月采用“对华新政策”。对汪政权来说，这是重新轮到他们出场的一个机会。从1942年12月1日起，汪精卫政权全面禁止法币的流通，军票也以1943年3月为限，停止新规发行，从形式上实现储备券的统一通货化。军队管理的工厂返还问题也于1943年春实行，结果是上海社会精英们开始与汪精卫政权协力。此外，以严厉的物资移动规则、军票、军配组织为中心的日军物流支配政策也发生变化，1943年3月，汪精卫政权组织了作为华中地区一元化物资统制机构的全国商业统制总会，公布《战时物资取缔暂时条例》。这一物流机构改革，使迄今为止的军配组织、日本商社独占的物流系统崩溃，中国业界和机构开始与日本对等地参与物资流通，立刻给物资流通带来了活力。

“对华新政策”实施后，汪精卫政权虽然得到很大权力，但是，它也导致了汪精卫政权的崩溃。军票新规停止发行前夕的1943年

1 前引《“汉奸”の诸相——汪精卫政权をめぐる》，163页。

2月,日本政府决定将以往由公债来维持的现地军事费改为由通过横滨正金银行筹措储备券来维持。这就使现地军事费的负担者不再是日本而是汪精卫政权,此后,日军便不再为维持军票的价值而煞费苦心,他们不断地使用存入横滨正金银行的储备券购买军需物资。如此,储备券随着统一通货化在步入激增的通货膨胀的历史里露出了破绽。同时,汪精卫政权组织全国商业统制总会,进行物流机构改革,动员中国商人将物资最大限度地抛出,造成了物资不足、投机和物价高涨的恶果。总之,由于日本对华新政策的实施,汪精卫政权表面上获得了自主权,而实际却是为日本急迫的物资掠夺政策提供了服务,并自挖墙脚,导致了其统治基盘的崩解。

四、战时上海的残留者

如前所述,古厩先生将上海作为中国抗战力量的三极构造之一,更以生活在上海的中国民众为基盘提出抗战力量的形成问题,并对日本占领下的战时上海残留者勾画了以下的轮廓。即,面对日本的侵略,上海社会精英和市民的一部分为了长期抗战向重庆等地内迁,另一部分则留在上海。留在上海的人由以下几部分构成。¹

投身抗日救国的人们

在“孤岛化”的上海租界,存在着国民政府系统的政治、行政、金融机构,与蓝衣社和新四军有联系的活动家不顾当局的取缔,展开了活跃的抗日运动。在知识人、青年、学生中,为了抗日斗争投身武汉、重庆、延安的不在少数。同时还有像郑振铎、许广平那样“不管是恶狼捕食,还是狡狐来回搜索,忍住眼泪,吞声屏息,怒视着这些妖魔鬼怪的狰狞面目”,为抵抗而留在上海的人们。

¹ 前引《日中战争·上海·私》,古厩忠夫《战后地域社会の再编と対日协力者》(姬田光义编《战后中国国民政府史的研究》,中央大学出版部,2001年)。

社会精英、民族资产阶级

以上海为生活基盘的社会精英和作为经济活动基盘的民族资产阶级留在上海的也很多。上海的地方上层有商绅的结帮传统，其阶级意识和高度的自治意识，激励着他们长期以来不停地与租界对抗，建立自己的社区。处于日本占领下的地域基层社会，抵制日本的劝诱，同时却为了维持生产和生活的需要被迫与日军接触，最终陷入不得不与执物资流通之牛耳的日本作交易的尴尬境地。

此外，上海资产阶级的志向和行动形态也是多种多样的，民族资产阶级的行动规则是“资本性”和“民族性”，他们在可能的范围内不会停止资产阶级的作为，追求以利润为前提的民族立场。¹所以，出于自身利益不响应“内迁”号召而留在上海的“狡猾”的企业家是不少的，其中还包括与日本方面做交易而尝到甜头的企业家。特别是在1941年12月8日以后，由于其生活所在地上海租界的陷落，继续在上海进行企业活动不可避免地要与日本及傀儡政权接触。中小资产阶级不如大资本家那样掌有政治力、情报力，特别是原料补给和贩卖网络，他们未能掌握经济基盘和财政力，因此事态就更严重了。

多数的“弱者”

1937年11月国民政府军撤退后，还有一些无处可去而继续留在上海的人们。正如中国共产党很早就指出的那样，走向抗日战争的胜利之路，除了放弃城市撤向大后方进行“持久战”之外，没有其他的出路。但是，当时的上海有很多与其说没有能够内迁，还不如说没有被要求内迁而“残留”的“弱者”。他们是没有直接的抗战力，包括老人、孩子、妇女在内的300万上海市民中的大部分。特别是第二次上海事变时，为逃避战火涌入上海的难民使租界人口膨胀到450万，他们几乎都是属于“残留的人们”，因此，“难民问题”成

¹ 前引《日中战争と上海民族资本》，90—91页。

为日中战争中最深刻的问题之一。古厐先生特别指出,大后方的抗战势力并没有抛弃这些“残留者”,在严酷的形势下,即便是“残留者”,抗战势力也以最大限度的努力组织其可能的抗日行动,由抗敌后援会对民众进行组织化。

对日协力者

在残留上海的各阶层中都存在对日协力者,即被称为“汉奸”的那些人。抗日战争时期,根据共产党的主张,一切抵抗日本的阶级、阶层及社会集团都列入“人民”的范畴,而日本帝国主义、民族叛徒、亲日派都是“人民的敌人”。虽然汉奸意味着“民族叛徒、亲日派”,但以何种标准来划分识别亲日行为和认定谁是亲日派却不是容易做到的。即使是对日协力者,其表现也是多种多样的,古厐先生对此作了以下的分类。

A. 积极的对日协力者

B. 处在行政机构和经济机构的基层,不得不与日本势力发生联系的人们

C. 在日本的统治下被强迫对日协力,被动地不得不活下去的人们,即所谓的“小汉奸”

A类是以汪精卫为首的一类人,出于政治原因主动选择与日本协力,积极参加傀儡政权。其动机无论是出于“曲线抗日”的政治预见,还是因为权力欲,亦或是纯粹的猎取官位之徒,结果都不能免除其汉奸的罪名。

B类是像闻兰亭那样的上海社会精英,他们一般不积极地对日协力,但由于是地方行政机构和经济机构的责任者,为了地方的生产和生活而被迫与日本占领当局发生关系。他们是负责地方行政的社会上层,在长期占领下的地区成为了问题。

C类是一般民众,他们为了生存而被迫为日军工作。他们是留在上海的“弱者”,这些“小汉奸”的问题不仅有其个人的意志和素质的原因,也有抗战方面的政治、组织化和生活改善的问题。为此,共产党很早就提出要严格区分“小汉奸”与大汉奸,并予以保护的主张。

其中,古厐先生特别强调在B类中,要明确分清黑白是非是